

魏  
晋  
南  
北  
朝  
骈  
文  
史  
论

丁红旗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I 201.225  
20122

# 魏 晋 南 北 朝 骈 文 史 论

丁红旗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魏晋南北朝骈文史论/ 丁红旗著. —4 版. —成都:  
巴蜀书社, 2012. 5  
ISBN 978-7-5531-0019-7

I. ①魏… II. ①丁… III. ①骈文—文学史—研究—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9529 号

魏晋南北朝骈文史论

丁红旗 著

---

责任编辑	施 维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40mm×170mm
印 张	17.5
字 数	3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31-0019-7
定 价	35.00 元

---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绪论：当代视野下的魏晋南北朝骈文研究 .....	001
第一章 汉末到魏：骈文的继续酝酿 .....	021
第一节 从鸿都门学、蔡邕到建安文学 .....	023
第二节 通脱与言情 .....	029
第三节 骋辞与藻饰 .....	034
第四节 正始之音哀以思 .....	053
第二章 西晋：国家观念的弱化及骈散的杂陈 .....	065
第一节 国家观念的弱化 .....	065
第二节 文学观念的重要转变 .....	074
第三节 西晋：博闻强记的推崇 .....	077
第四节 缚旨星稠，繁文绮合 .....	081
第五节 拟遗迹于成轨，咏新曲于故声 .....	090
第六节 散文的空间 .....	100
第三章 东晋：文坛的凄凉、凋落与变异 .....	105
第一节 东晋品格 .....	105
第二节 因谈余气，流成文体：玄风弥漫下的清丽 .....	111
第三节 学术文化的缓慢蕴育 .....	117



第四章 刘宋——骈文的成熟 .....	125
第一节 右文风尚 .....	125
第二节 东晋南朝察举制度与文学 .....	131
第三节 来自主流的声音：从孙绰到傅亮、谢灵运、颜延之 .....	145
第四节 刘宋时期：骈俪——典雅文风的载体 .....	155
第五章 萧齐——骈文的转向与要素的完备 .....	161
第一节 齐梁时的纵逸之俗及骈俪兴盛的社会背景 .....	161
第二节 争趋求新 .....	174
第三节 永明声律 .....	178
第四节 骈文成熟下的进一步开掘 .....	184
第五节 声情流利、圆美的追求 .....	195
第六章 梁朝——骈文的繁盛 .....	207
第一节 梁武帝与文学 .....	207
第二节 关注视野的窄狭及文风的转向 .....	215
第三节 隶事手法的纯熟与高妙 .....	224
第四节 时人对骈俪文风的总结与评判 .....	232
第五节 梁代骈文的审视 .....	239
第七章 陈到隋——繁盛中的变异 .....	251
第一节 文风转变的契机：乱离中的沉痛与反思 .....	251
第二节 骈文的高峰：徐庾体 .....	257
第三节 南北朝的交流与文风的融合及隋代骈文 .....	265
后记 .....	273

# 当代视野下的 魏晋南北朝骈文研究

## 一

当时间进入了纷繁、甚或喧嚣的 21 世纪，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研究而言，凝视、打量，甚至盘点、反思这一时期的诸多研究，似乎很有必要，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毕竟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代。不管你是否清醒地意识到或肯定过，20 世纪业已过去；而过去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流逝；上个世纪关涉这一时段文学研究的视野、角度和方法，仍需要进一步论辨、反思、质疑或肯定。从清儒到近代、现代，甚至当代，古代文学研究明显地走向了一条越发宽广的道路，也累积了一些足以让我们分析、借鉴和思索的古代文学研究的视野、角度和方法；特别在史学领域，新的观念日益冲蚀、颠覆传统的史学而走向现代、当代。文史自古一家，史学领域的更易、革新又足以给文学史的研究带来特有的冲击；或者说，从借鉴的角度，能构成文学研究变更、增长的一个基点。不可否认，20 世纪以来文学视野、观念的变更正是发端于史学的研究，“六经皆史”，“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等，都正是标准的史学畛域。因此，凝视、打量之余，如何在新的视野、角度和方法上，让有效的视野、方法浮出地表，以资所用，来进一步深化文学研究，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有时，必要的回视昔日路径，展望未来，能构成文学研究者前行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任何研究都有一些不言自明的前提与理据；对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也必然要有





所区别而不可一概而论。1930年，一代学人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称：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sup>①</sup>

这话当然也适宜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只不过，与先秦、唐宋元明清文学研究相比，这一时段的文学研究却不免有自己独特的前提和条件：

这一段文学史，不象某些领域一样有什么“珍密材料”和忽然冒出来的“重要文物”，所能见到的都是人所常见之书。<sup>②</sup>

大凡研究中古文学史的学人都知道，这一领域已很难有孤本秘籍的发现，材料大致现成，前人也有种种既成说法，重要的是深入钻研，从头开掘，才会有所发明，有所创获。<sup>③</sup>

之所以多加例举，意在说明这一时段新材料确实是比较少的；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的说法。如《唐钞文选集注》的著录，最早见于日本森立之在孝明天皇安政三年（1856）所撰的《经籍访古志》卷六“总类”。进入20世纪初，日本学者如斯波六郎等，陆续开始对其研究。光、宣以后（1908），中国学者如罗振玉、董康等，也渐次接触到这些珍本，罗氏甚至还不惜以变卖房屋的巨资影印，编成《唐写文选集注残本》而广为流布。2000年，南京大学周勋初又广加搜罗、编成《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出版，更为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文献基础，也能极大地推动“《文选》学”的相关研究。但基础史料的搜集还未完毕，2011年又略有补充。<sup>④</sup> 世人所熟知的1996年7月到11月长沙走马楼施工时发现的高达十万枚以上的三国吴简，无疑能极大地推动三国吴史的研究；然而，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内容——主要是长沙郡一地的户籍、名刺、请安、问候等，要直接用于文学研究，却不免勉为其难；毕竟，这些内容与文学悬隔了一

① 这也实际上是其师王国维先生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中所提观念“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新发现”的变异和继承。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说明：为保持注释的简明，本论文所有引自正史的文献，以及单篇文章（单篇文章如没直接标明出自某书，则一概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为准），一般不再单独注出页码，仅标明卷次，以备翻检；其他引自专著的，则标明版本、页码。又，注释第一次出现的，标明版本；再次出现时，只标书名、页码。

② 沈玉成《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序》，中华书局，1986年。

③ 邓绍基《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序》，（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

④ 再版时“增加了三件残片和一件残卷”，见《古籍新书报》2011年11月28日。又，傅刚《〈文选集注〉的发现、流传与整理》（《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第4—17页）有较详细的论述。



段不近的距离。<sup>①</sup>当然，敦煌文献中保留有一些文学作品，比如饶宗颐先生就曾“网罗世界各地收藏《昭明文选》古写本之残缣零简”（《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序》）而编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然其系统性、完整性却颇为欠缺，零散、残破、漫漶的记载似乎很难构成对这一时段文学研究的有力冲击（当然敦煌文献对《昭明文选》研究的推动却委实不可忽略）。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先生所指涉的“新材料”对这一时段的文学研究的作用，无疑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当然，这一时段文献自身的传承也有不可忽视的原因：一，当东晋末年桓玄发布以纸质代替简帛时，<sup>②</sup>纸质文献的普遍流行无疑极大地推进了当时知识、学术的发展，这从此后（即宋齐梁时期）私人藏书的数量可窥一斑。经过永嘉大乱，几乎散佚殆尽的东晋，元帝时的书目总数才三千余卷。之后，经过东晋、宋一百六十年的发展，才慢慢有了些藏书。但史籍可考的也仅是寥寥数家，如谢弘微分家产时，“唯受书数千卷”，褚彦回“唯取书数千卷”，沈亮得“赐书二千卷”<sup>③</sup>就是说藏书达数千卷的就已进入了史臣载人的视野。这三人都是当日的高门士族，谢弘微是当日一流高门陈郡谢氏，褚彦回出自阳翟褚氏，其父褚湛之尚刘裕七女始安哀公主，沈亮则是南地土著吴兴沈氏。这一情形到了南齐就有了长足的进展，已出现了藏书万卷的人，如崔慰祖、陆澄。尽管南齐末年，萧衍举兵向阙时兵火延及秘阁，但对藏书并无特大影响，而且随着梁朝近五十年的承平，藏书量急剧增多，几千卷已不稀罕，万卷以上的所在多有。这些都说明了随着纸张的普遍应用而带来知识的倍增。但也毫无疑问，受纸质文献留存年代的限制——这些文献实在不易或不能穿越漫长的时光而走出地面，走到现代。再者，这一时期的文化中心建康，因原野

<sup>①</sup> 关于这批竹简的整理情况，有以下基础文献：《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简》（文物出版社，1999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贰）（文物出版社，2007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叁）（文物出版社，2008年）。其重要的研究著作有：《长沙吴简研究报告》（第一集，日本东京，2001年）、《长沙吴简研究报告》（第二集，日本东京，2004年）、于振波《走马楼吴简初探》（文津出版社，2004年）、《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5年）、于振波《走马楼吴简续探》（文津出版社，2007年）、高敏《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

<sup>②</sup> 《太平御览》卷六零五引《桓玄伪事》：“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细审其意，是说一些人逆潮流而用简，以主于敬；其潜台词当为俗世已多用纸；非是因诏令的存在才普遍用纸。其所说的“黄纸”，是“染以黄檗，取其辟蠹”（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是南北朝时较普遍使用的一种纸。

<sup>③</sup> 分别见《宋书》卷五十八《谢弘微传》、《南史》卷二十八《褚渊传》、《宋书》卷一百《自序》。





卑湿，无疑又加剧、恶化了这一问题。这一时段地下文物出土之少，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二，禁碑的存在。据《宋书》卷十五《礼志》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此则碑禁尚严也。……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基本上都是因要减杀厚葬之风，同时也憎恶碑铭记载的失实而令行禁止；因此，其间虽有反复，但基本上是一直禁断。这一时期出土的墓志碑铭较少，也直接证实了这一点。<sup>①</sup> 三，历经侯景之乱、江陵焚书，江南的国家藏书几乎荡然无存。<sup>②</sup> 这是客观的限制，今人已无如其何。这样，陈先生所说的“新材料”对这一时段的研究就不免有了虚置的意味。然而，追溯下去，这还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对这一段文学的研究，在学术坛里是比较寂寞的，远远比不上唐诗研究或者《红楼梦》研究那么显赫。<sup>③</sup>

中古文学的研究，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确是较为冷寂的。<sup>④</sup>

请注意“寂寞”、“冷寂”的字眼。“自然难以形成热门或热点”，傅先生客气的话语中，仍透露出这一时段文学研究无可置疑的冷寂，话语之中甚至不免杂有一丝苦涩。1998年，刘跃进先生曾对《文学遗产》的稿件进行精确却不无模糊的表述：

从近年来稿情况看，上古、中古文学研究稿件，平均每年在一百篇到一百五十篇左右。其中，多数是中古文学研究论文，通常占三分之二。<sup>⑤</sup>

刘先生话语似乎还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其他时段文学研究的来稿，则远高于这个数字；不过，不管怎样，数据的客观无疑彰显了这一时段学者研究的一个难堪境地。这是因为，一时代文学研究的问题和困

① 这一时期墓志碑铭出土的情形，可参见赵超《汉魏晋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罗新、叶炜著《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

② 这一点，可参阅拙作《梁代私家藏书考》，《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2期，以及《〈金楼子·聚书〉所反映萧绎藏书及齐梁间书籍流通》，《文献》2010年第3期。

③ 沈玉成《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序》，中华书局，1986年。

④ 傅璇琮《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序》，（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

⑤ 刘跃进《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关于上古、中古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182页。



境固然很多；但这种现实却无疑有一个重要，且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这一时段的文学研究，如何摆脱这种难堪的境地，走出低谷，或浮出水面？这中间，背景的凸显和浮出，就不失为一种较有效的视野、角度和方法。先看上个世纪早期发表的三篇文章：

1917年2月，王国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1927年鲁迅在广州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1934年，陈寅恪发表《四声三问》（原刊《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

这三篇文章，虽不足以代表那一时代学术研究的视野、角度和方法，但至少能提供一些思考。1909年，日本人白鸟库吉在《东洋时报》第131号上发表了《中国古代传说之研究》一文。白鸟说，尧舜禹是儒家的传说，表现了上层的思想。白鸟的目的很清楚，是“瓦解中国古史在亚洲的地位，解除古代中国对日本文化的笼罩”。<sup>①</sup>正是在这一时期，“古史辨”派开展得如火如荼，顾颉刚与胡适等人，以“层层累积”的“箭垛式”的思想，清除了附着、包裹在古史上的种种传说。因为“疑古”，古人有意无意地裹袭、涂抹的色彩几乎被一扫而光。王国维《先公先王考》的意义就在于，它在清扫光了的纸上重新涂上了被人为割断了的古史脉络。王氏以甲骨卜辞充分地证实了《世本》、《史记》所载的上古殷商世系的正确性——这自然也给了白鸟类的人以有力的反击，有了民族家国上的意义。

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学术的视野、角度和方法开始跨进了现代。清儒的思想是使用十三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诸种文集等传世的精英思想的文献，来审定、考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但是，西方思想的涌入，甲骨文、敦煌遗书、汉简以及清宫大内档案的次第出现，却迫使学术研究在不得不接受这些新材料的同时而建立起新的视野、角度和方法。得风气之先，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sup>②</sup>陈寅恪先生提出“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sup>③</sup>就不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冲击下一个必然的结果；史料的扩展、延伸必然会带来方法的更新和视

①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三联书店，2006年，第122页。

② 1925年9月，王国维发表了在学术界著名的题为《古史新证》的演讲：“一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二重证据法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

③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论王国维治学方法，举三目以概括。具体内容见后。原文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野的拓宽。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就充分彰显了他的学术主张。《四声三问》中，陈氏所用的资料，虽仍不脱传统经典文献的范围；其思路却无疑是崭新的，即异域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渗透和影响。陈氏证明了“四声”即声律与佛教“转读”等实有密切的关系。<sup>①</sup>这是因为“佛教东渐”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了在中国扎根、变异的过程；士人的接受，也正带来了新的思想，以及新的文学体裁和表现内容。陈氏对异域文明文献比较熟悉，又有深入的研究——这无疑投射到了他的历史研究领域。陈氏深刻地洞见了这一时代的重大变迁，并以具体的研究做出了回应。鲁迅的洞见则在于他以简明、深刻的剖析，揭示了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清晰地展示了那个遥远时代士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当然，这也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即鲁迅此文中所概括的四个特点“清峻”、“通脱”、“骋辞”、“华靡”，实际上是源自刘师培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中所推举的内容；一时间鲁迅显赫的声势也似乎遮蔽了刘氏不凡的洞见。这是三篇内容不一的文章，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都着力凸显、系联上了因时光漫漶、史籍散佚而带来的解读断裂，清晰了含混、模糊的存在背景。这样，散漫、零碎的知识，正因了背景有力的支撑而明晰、系统，有了解读的可能。这正是凸显背景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这样，背景的找寻、勾勒，就在断裂、零散的资料和价值判断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50年代，鲁迅未竟的研究为王瑶先生所继承。在勾勒、阐述这一时期宏阔的思想、信仰等背景时，王氏又添进了鲁迅所未涉及的内容，如《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论希企隐逸之风》、《拟古与作伪》等文，从而使得那一时段的社会生活、思想和信仰得到了比较全面、广泛的展示。这样，魏晋六朝这一时段的整体生态环境、氛围，因了这些文章的存在，就比较清晰地浮现出来；以此为发端，也构建了一个后人可资前行稳固、可靠的根基。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刘师培、鲁迅二人都是在时代思潮的鼓荡下，表现出特有的视野、角度和方法。刘氏受益于深博的家学，<sup>②</sup>

① 当然，对此问题当代有进一步的质疑和探讨，如郭绍虞《再论永明声病说》（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詹瑛《四声五音及其在魏六朝中之应用》（《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刘跃进《永明诗歌平议》（《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等，从而使问题能够进一步深入。

② 在母亲李汝蕙的教授下，刘师培八岁就开始学《周易》辨卦，十二岁读完四书五经，并开始学习试帖试。1897年起开始研究《晏》。



实际上带有总结清儒研究视野和方法的意蕴。刘氏在传统的诸子学、经学、理学、考据学之外，又将地理、小学等纳入文学的视野。刘氏的《中古文学史》之所以受人喜爱，历传不衰，就不得不归功于他对历史变迁本来态势的尊重，即对历史文本的尊重；鲁迅赞誉的着眼点，也实在于此。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学背景的凸显，刘氏曾概括：

今之研治汉魏六朝文学者，或寻源以竞流，或沿流而溯源，上下贯通，乃克参透一家之真相。<sup>①</sup>

《中古文学史》撰成于1917年，刘氏始任北京大学教授，得风气之先而有了总结的意味。但刘氏的视野未免有所不足，至少，1902年梁启超先生的《新史学》已在倡导要摆脱帝王为中心的政治史——即已开始有意摆落精英、经典的历史，而遥指向一般与边缘。如果把刘氏的《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跟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作一比较，就发现梁氏又涉及：一、金石及其铭文，二、外国人的著述。这两点刘氏只字未提，就未免是一个大的遗憾；因为在那个时节，至少敦煌卷子已面世十多年，罗振玉、王国维等正研究得如火如荼，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也正发表在这一年。按照梁氏的思路来审视这一时段的文学，无疑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当然，按照后现代史学的观点，历史中因为掺进了价值、思想和情感，而成了文学性叙述的“文本”；由此中间有了种种虚构、叙述、遮蔽和掩盖。但是，那个真实的历史存在却无疑会始终限制着历史的书写。就是说，历史尽管是“叙述”出来的，有书写者的价值、思想和情感，但毫无疑问，也在反映着那个真实存在的历史——只不过，程度深浅不同罢了。也因此，即便我们不能真实再现历史，但却可向这个目标渐次靠近，绝非是一无作为。在这个意义上，背景的凸显不仅是有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它能够让我们系联上因时光沉湮、史籍散佚而带来解读的断裂，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价值、思想和情感。毕竟，零散的、被遮蔽，甚至杂乱的史料要梳理，就不得不去借助于背景去想象，去填补，去推测这中间缺失的环节；否则，零散、杂乱的史料就成了拆碎的七宝楼台，仅仅是一些断片而已。这当然有些勉为其难；但却不妨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一种策略。那么，历史的背景如何凸显呢？

<sup>①</sup>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十六，上海世纪集团出版，2006年，第136页。



古今论陶渊明的文章数不胜数，但不可否认的是，立论的基点大抵都承袭梁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古今隐逸之宗”的观点，即因“耻事二姓”而隐居，推为隐逸诗人。而对陶渊明的研究能灵光独具，恐怕不得不推陈寅恪先生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sup>①</sup>与曹道衡先生的《略论晋宋之际的江州文人集团》<sup>②</sup>。

陈文认为，陶氏种姓出于世奉天师道的溪族；陶渊明之所以绝不见其受佛教的影响，就是因为对其家传信仰能“独具胜解”，能一生保持其世传天师道的信仰。这种思想，最典型地体现在《形神影赠答》一诗中，即主张新自然说，要旨则在委运任化。这样，陈文以家传信仰的角度，洞见了为何陶渊明不见一丝佛教影响的较为真切的原因。显然，这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正不妨看做是陈氏这一时段学术研究所走之路的缩影。陈氏执著于探索事情的渊源流转、迁变，而魏晋南朝的高门又是解读这一时段历史所不可或缺的背景；因此，从此角度切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陈氏的高明在于，在寻常的史料中，独具慧眼，发现陶氏家传信仰以及对此“独具胜解”，而不受佛教影响的真实原因，从而为陶渊明信仰解读的断裂系上了有力的一环。这是从家族的角度，曹文则从地域的角度，阐释了陶渊明的隐逸高出并非是一个孤峰特立的现象，而是一个时段、一个地域熏陶下必然出现的事。在东晋中叶至晋宋之际的荆州和江州一带，曾经居住着不少隐逸之士，如湛方生、刘麟之、翟汤、周子南、孟嘉等，这些文化修养颇高的人，之所以选择隐逸，与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人们的地域偏见——即江州士人在仕途上的坎坷遭际有很大关系。

这样，陈文以家族文化这把犀利的刀，深刻地剖析了之前一直未能很好解释的陶渊明信仰问题。曹文的洞见就在于，陶渊明之隐逸实不过是江州这个地域下一个普通的现象。两篇文章结合起来，正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千年来前人所未能了解、洞悉的陶渊明之隐逸高出，不过是一件极普通、自然的事——至此，问题有了令人信服的阐释。表面上看，从家族到地域，似乎只是视野、角度和方法的变更，实际上却有自己内在的发展理路，即背景的凸显已开始从四五十年代家族社会等宏阔的社会考察中，转变到90年代以来的微观探求。因此，在这一点上，这一时段的学术研究不妨着力探究这一时段，这一地域较长时间、较为稳定的自然、社会及文化

① 文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② 《中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第19—26页。



背景——即背景的凸显。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才可能比较清晰地浮现出整体风貌，零散、杂乱的史实才有了整体、明晰的意义和价值。有时，借助一点来洞察、勾勒特定的社会生活氛围或制度，就或许更为迫切和敦实。已故的史学家唐长孺先生的《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一文，就以《赵至传》、《世说新语·言语》中一些特异的现象，即“至年十五，阳病，数数狂走，五里三里为家迫得。又炙身体十余处，年十六，遂亡命”而剖析背后的原因，<sup>①</sup>借此一点凸显出曹魏时士家制度的一个重要侧面，即“士家制度的严格及其加于兵士的残酷压迫”。受其启发，拙作《陆机〈羽扇赋〉试释兼论南北隔阂》<sup>②</sup>就从陆机《羽扇赋》中的特异之处，“大晋附吴，亦迁其羽扇，御于上国”，<sup>③</sup>羽扇已沦为亡国的象征入手，来透视、凸显那一时期特有的南北对峙情绪。这样，它至少能为研讨这一时段的南北隔阂提供一个典型的例证。

在开阔的视野下，不妨从经济、政治、文化、学术、哲学、宗教、风俗等角度来透视、浮现这一时段的整体风貌和生活场景，并在此基础上洞幽察微；融汇不同的角度，无疑能更好地显示不同的特质和揭示真相。在现实的文学研究中，有些领域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比如，从政治的角度，尽管姚察在《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传论》以及李谔《上书正文体》中都说得非常清楚，“近代取人，多由文史”，“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即这一时段的选举制度对当日文学实有巨大而且深刻的影响；这还可能更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代文学的走向——显然这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研究领域。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几乎寥若晨星。为此，本人已粗略地进行了一些梳理、探讨。<sup>④</sup>再如从经济的角度，如庄园经济与文学，都应该是可以涉及、深入的领域。虽然，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或者说限制，即史料的散佚带来“文献不足征”的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其难度增大，总比一窝蜂地挤进陶渊明、谢灵运的研究领域，让陈词滥调充溢于论文要好一些。也就是说，背景的凸显并不只是精英、经典的背景，而应向下、向四周、边缘扩散

①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1978年，第33页。

②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3期，第32—37页。

③ 稽含《羽扇赋·序》。

④ 文见陈海燕、丁红旗《东晋南北朝察举制度与文学》，《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166—170页。



——探求普通民众，即一般的思想、信仰和技术。在这种背景中，就会发现，所谓的精英、经典思想，都不过是在广泛民众中蕴育的东西，它蕴育于特定的社会生活、时代思潮；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字里行间发现被删削、遮蔽、文饰，或篡改、涂抹了的东西。宏阔的视野当然需要“识力”；学而有识，读而能通，即需要一种通识，一种深厚的学养——这自然需要时间和努力。

历来论这一时段的文学，多爱以或习惯以战火纷飞、南北阻隔的现实作为一个宏阔的欲彰显的背景来研讨、投射这三百年间文学，这不能说不；但明显失之简略、粗率。姑且举两个例子。第一，尽管整个东晋南朝，为争权夺利，统治阶级内部杀戮、流血不断；但高门，特别是一流高门，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的地位就一直比较稳固，由此也让学者不得不承认他们是这一时段文学、文化传承之有力者。因为，每一个朝代禅让者都会无一例外地让世家子弟奉授玺书，借助于世家的声望或实力来收拾人心，稳定其统治——这当然是世家高门在当日比较稳定的势力和声誉所致。有时，即便是高高在上的皇权也不得不做出让步。纪僧真幸于齐武帝，曾向武帝“乞作士大夫”，武帝曰：“由江教，谢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造诣江教，刚刚登榻坐定，江教便命左右“移吾床让客”，没办法，纪僧真只得丧气而退，告诉武帝：“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sup>①</sup>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退一步说，即便在杀戮、流血中，高门自可以一己门第为转移（这种行径，当然为后人所鄙夷、不齿），为维持或增进门第势力而做出文化上的努力，出现在东晋末年的“乌衣之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sup>②</sup>——这就在事实上保证了文化、学术的延伸和发展，不至于呈现大的断裂。第二，这一时期南北分裂、山河阻隔；但是地域间的分割不仅不是凝定不变的，更重要的还是南北不时地遣使往来，修书交好。在一定意义上，东晋末年桓温、刘裕北伐，就不妨说是以一种异常的形式，促进了不同区域间的文化的传播和融合。因此，这一时期南北遣使往来，交流的途路尽管不畅，时有中断，但它客观上所起的作用却委实不可忽略。这种特殊情形下的交流至少能让人看到，南北是如何在战火纷飞、颇多杀戮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融合，最终融铸成后人每每赞誉的盛唐文化的。这样，探讨其间的一些交往细节，并论其影响，无疑是一个饶

① 《南史》卷三十六《江教传》。

② 见拙文《“乌衣之游”考》，《宜宾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第17—20页。



有兴趣的话题。1939年，陈寅恪先生写了一篇《读〈哀江南赋〉》；无独有偶，六十年后，曹道衡先生也写了一篇类似角度的文章《读贾岱宗〈大狗赋〉兼论伪〈古文尚书〉流行北朝的时间》。<sup>①</sup>《读〈哀江南赋〉》中，陈氏认为，“解释词句，征引故实”，“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而想考知‘今典’，就必须断定，一、“此事发生必在作此文之前”，二、“又须推得作者有闻见之可能”。以此为发端，作者在详细考察陈、周通好的史料后，加按语“所应注意者，即此二十年间流寓关中之南士，屡有东归之事，而子山则屡失此机缘。不但其思归无望，哀怨因以益甚。其前后所以图归不成之经过，亦不觉形之言语，以著其愤慨。”否则，“若非深悉其内容委曲者，哀江南赋哀怨之词，尚不能通解矣”。为此，“为读哀江南赋者进一解”。<sup>②</sup>博识慎思的曹先生则独具慧眼，敏锐地从《大狗赋》中的一句话“越彼西旅，大犬是获”，发现了一个经学问题，即这句话是出自伪《古文尚书》。而伪《古文尚书》初始是流行于江左的，“江左学者，咸祖焉”（孔颖达《尚书正义序》）；但在宋明帝初年，今山东及淮北一带并入了北魏，许多南朝士人入北，显然会带去不少典籍，其中当包括《古文尚书》和伪孔传。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北魏孝文帝以后，引用伪《古文尚书》的人很多。据此，曹先生推知了伪《古文尚书》流行的时间及《大狗赋》的作者。

这样，一个从史学，一个从经学，共同探讨了南北朝特定情形下的交流和影响。它非惟有助于史实的疏通和理解；更以其创见，对其间的文化交流涂上了精彩的一笔。记得一位教授就曾谆谆告诫，“由经学入史学，史学可信；由史学入文学，文学可信”。一句话，就是具有经学、史学的根柢——这才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关键所在。虽然，经学在今日早已退出了往日的主流位置，甚至在一些人的功利视野中淡化、消褪；但是，古代的经学——由官方认可和赋予的价值、判断、思想无疑会因利禄、声名等缘故而渗入、普及到民众的生活，进而让其生活附着上了浓重的经学（儒学）色彩。显然，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是无法避开、绕开这种真切的生活和氛围；也唯有如此，恐怕才能较好地解决、阐释一些问题。此处，曹先生

① 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续集》，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340—346页。

② 当然，陈氏所说的“所以图归不成”，则实可商榷，庾信并非真的想返回陈朝，其辨可参看“乡关之思”一节。亦可见拙文《长安的明月——读庾信〈哀江南赋〉》，《文史知识》2009年第8期，第38—43页。



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当的范例，经学并不是一堆废纸，而是当日活生生的现实。章学诚“六经皆史”固有偏颇之处；却不正一语道破经学所涵蕴的真切历史——这又足以让我们透过表层，看到一段被沉湮的鲜活历史。

## 二

转到这一时期的骈文研究，也自有其特别的社会文化氛围。这似乎是一个规律：盛极必衰；或盛极之下，难以为继，兴盛中潜伏、蕴育着危机。伴随着南北朝骈文的兴盛——以骈丽为特点，讲求隶事、藻饰，甚至声律的骈文几乎浸淫了一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其末流之弊也日益显露，至少从裴子野、苏绰、李谔，到陈子昂，其间的批评绵延不绝。只不过，这些异样的声音确实微弱了些——不仅不能倾动根基，也不能动摇其主流地位。因指责而加以修正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当苏绰用不切于时宜的《大诰》来整齐骈俪文风时，似乎就无意间潜伏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通过政治来解决文学问题；这显然有失偏颇。遗憾的是，唐宋古文家却正是不折不扣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一条充郁着浓重政治内涵的路；尽管就在那个时代，是一种不得已等而下的选择。当他们一概以“八代之衰”来对待魏晋六朝文学时，这种观念无疑是建立在一个松软的沙滩上；把唐宋文学直接上承秦汉，进而为自己的运动找到一个似乎合理、自然的源头。意愿是良好的，但也显然有失公允，因为它活生生地剥离了一段历史。这当然不是理性的审慎态度。重要的是，一、六朝人本无所谓骈、散，四六的概念最早也只是出现在李商隐的《樊南四六》；二、六朝文是秦汉文的自然发展，更是唐代文学兴盛的前奏和必要的累积；至少，唐初史臣修《隋书》时说的“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就是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是达到“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的必经途径之一；这就充分表明了一种认可和审慎的态度。这样，唐宋古文家以一种不无偏颇的视野来矫正另一种偏颇（当然，这在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也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其结果恐怕只能是意气用事（这一点，在以后清代的骈散

